

扫描文明命运 纵论中国历史

王鸿生◎著

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

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

王鸿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瀑布与峡谷：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 / 王鸿生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00-08183-0

I . 历…

II . 王…

III .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993 号



历史的瀑布与峡谷——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

王鸿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 - 88879833

编辑热线:010 - 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1 000 定 价 24.80 元

关于本书

作者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政统、道统、学统、法统角度，对古代中华文明作文化结构分析，视其为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文明。政统的主导作用体现为择道、立法、统学。道统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提供文化解释，并覆盖学术，渗透法治。传统中华文明未发育出独立的学术和法治文化系统，且存在无法摆脱的系统困境，不能走上自我现代化的道路，但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结构性变化，遭遇了“道穷政息”的文化命运。辛亥革命实现了中国政统和道统的革命，中国法治文化有了新的政治基础，学术文化也逐渐发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刷新了中国政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塑并发展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从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文明转变为学统引导、法统支撑的现代文明，而政统则由主导发展转变为调控和引领发展，道统仍将起凝聚社会、整合价值理想的作用。

关于作者

王鸿生，甘肃景泰人，西北工业大学工学学士，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2004—2005年曾在韩国做高级研究学者。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从远古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等。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网址：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责任编辑：张杰

版式设计：孟庆磊

封面设计： 大象設計工作室·倪志強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8488303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 |
|----------------------------------|----|
| 导言 | 1 |
| 一、扫描文明命运 | 1 |
| 二、纵论中国历史 | 4 |
| 第一章 文明交点上的困惑和追问 | 10 |
| 一、斯芬克斯的谜底 | 10 |
| 1. 文明天平的倾斜 | 10 |
| 2. 马克斯·韦伯的思考 | 11 |
| 3. 李约瑟的疑问 | 13 |
| 4. 寻找问题的答案 | 15 |
| 5. 历史中的新问题 | 17 |
| 6. 中国学人间历史 | 18 |
| 7. 问题的核心是文明转型 | 25 |
| 二、探悉文明的文化结构 | 26 |
| 1. 对文化的理解 | 26 |
| 2.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 28 |
| 3. 文化结构分析的方法 | 31 |
|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结构和系统 | 47 |
| 一、透视中华文明的视角 | 48 |
| 1. 钱穆：“农业文化论” | 48 |
| 2. 金观涛：“超稳定系统论” | 52 |

| | |
|-------------------------|-----|
| 3. 卦宗三：“三统说” | 56 |
| 4. 传统文明缺失“法统” | 60 |
| 二、“四统”方法论 | 64 |
| 1. “四统”的方法论意义 | 64 |
| 2. 道统、政统、学统和法统的内涵 | 67 |
| | |
| 第三章 传统文明中各文化系统的分析 | 82 |
| 一、政统是传统文明的主导 | 83 |
| 1. 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 | 83 |
| 2. 中华文明是政统主导的文明 | 86 |
| 3. 政统主导中华文明的形式 | 89 |
| 4. 政统主导中华文明的情理 | 91 |
| 二、道统对传统文明的支撑 | 99 |
| 1. 原始宗教的政治作用 | 99 |
| 2. 附着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 | 103 |
| 3. 多元意识形态的探索 | 106 |
| 4. 择儒为道的政治文化义蕴 | 110 |
| 5. 儒学道统的人文色彩和局限 | 117 |
| 三、依权附道的学术文化 | 127 |
| 1. 科学技术的圣王化和经化 | 127 |
| 2. 《周易》和中国“天文化” | 134 |
| 3. “天文化”的学术影响 | 139 |
| 4. 知识理性的文化困境 | 145 |
| 5. 主流文化中隐含的理性 | 152 |
| 四、传统文明中的法治文化 | 157 |
| 1. 依托权杖的正义天平 | 158 |
| 2. 皇权体制中的法治 | 162 |

| | |
|-----------------------------------|------------|
| 3. 法家、儒家和法治文化 | 166 |
| 五、中华传统文明的系统问题 | 169 |
| 1. 政统的暗区——换代问题 | 171 |
| 2. 历史的瀑布——改朝现象 | 175 |
| 3. 可持续发展视野里的历史震荡 | 179 |
|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 207 |
| 一、中西文明碰撞的文化效应 | 207 |
| 1. 中西古代文明的差异 | 209 |
| 2.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起点 | 213 |
| 3. 外部冲击的促变作用 | 217 |
| 4. 权力视野中的技术 | 219 |
| 5. 道统与政统的相互牵制 | 222 |
| 6. 背叛权力的新学统 | 227 |
| 二、新文明诞生期的文化特点 | 230 |
| 1. 文明转型的核心问题 | 230 |
| 2. 政统革命的价值分析 | 233 |
| 3. 道统革命的文化意义 | 241 |
| 4. 科学和民主的文化价值 | 245 |
| 第五章 中华文明的重塑和文化走向 | 266 |
| 一、政统再造的循旧与革新 | 266 |
| 1. 瞻前顾后的孙袁之别 | 267 |
| 2. 未能共和的国共之争 | 270 |
| 3. 政统革新的路向 | 278 |
| 二、道统的分裂与革新 | 283 |
| 1. 国民党的背“道”而行 | 284 |

| | |
|---------------------|------------|
| 2. 共产党新道的特点 | 286 |
| 3. 中华道统的发展 | 291 |
| 三、学统的发育和作用 | 293 |
| 四、法统的发育和作用 | 297 |
| 五、简短的结论和前瞻 | 301 |
| 1. 文明转型的大趋势 | 301 |
| 2. 中华文明转型纵览 | 305 |
| 主要参考文献 | 322 |
| 后记 | 330 |

导　　言

一、扫描文明命运

在古代,由于技术和交通的限制,各地域的文明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地球上还不存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明。就局域文明而言,中华文明有明显的独特性。

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古华夏文明,在特殊的地理和社会背景下,不断整合以北方草原文化为主的各类周边文化,逐步发展成以“中国”^[1]自称的东亚主体文明。自汉唐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印度文明中的佛教,自唐宋元明以来又包容了水平相近的伊斯兰文明,显示了很大的文化容量和文化重塑能力。与多数局域文明比较,中华文明规模超大,在东亚大陆相对独立地发育、传承并辐射,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类型有较强连续性。中国的技术也对周边地区乃至亚欧大陆文明的演进起过推动作用。

但在世界通往现代的路口,西方文明成了领头羊。古代中国文明没有走上自我现代化的道路。^[2]自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冲击,开始向现代转型。其间中国

与多数局域文明比较,中华文明规模超大,在东亚大陆相对独立地发育、传承并辐射,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类型有较强连续性。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优越感几被动摇,但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打击也有较强的抗御能力,还是通过缓慢而曲折的演进走上了独立和复兴的道路。

内忧外患交织,领土曾被切割,财富则被攫取,还产生了空前剧烈的文化冲突,发生了内容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优越感^[3]几被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拷问,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得到了调整和重塑。但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打击也有较强的抗御能力,还是通过缓慢而曲折的演进走上了独立和复兴的道路。这支规模巨大的文明经历了生存的考验,也经受着“文明”的洗礼。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文明的扩张,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规模广大、历史悠久的新大陆文明之果在被欧洲人采撷之后^[4],美洲古代文明自身却被殖民扩张的浪潮冲击成散落在西方文明角落和边缘的零珠碎玉,并且在现代世界被边缘化了。历史上最先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美洲印第安文明,为什么没能经受住欧洲文明的第一波冲击,从而基本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遇和整体复兴的可能性?

在欧亚大陆,由于地域关系,具有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底蕴的中国西邻印度最先被西方文明冲击,且在1757—1849年间沦为英国殖民地,丧失政治系统,但却保持了本土的宗教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次大陆很快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恢复了自己的政治系统,但却因宗教信仰层面的问题分裂成几个国家。^[5]独立后的次大陆国家在政治上刻下了西方烙印,在文化上则留下了更多传统内容。其现代化先在殖民地状况下进行,继而表现为殖民统治结束后的重光。

中国的东邻日本1853年在美国佩里舰队威逼下“开国”,受西方文明冲击的时间最晚。开国后的日本在意识形态上追求“文明开化”,在文化上追求“脱亚入欧”,在政治上通过明治维新形成以天皇为核心的集权制度,并以约束

国民自由、忽略他国人民生存发展权的方式推进现代化。^[6]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系统得到强化，意识形态渗入较多西方因素，技术进步迅速，但推动现代化的军国主义体制却经历了从扩张到挫败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法治和政治在美国的占领下被加以改造。

亚洲文明的现代转型，日本的情况是一极，印度的情况是另一极，中国的情况恰好处于中间。这恰好与中西文明对接的时空相关。中国地域处于印度和日本之间，后于印度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先于日本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与印度文明相比，中国的政治系统没有被列强摧毁和取代，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正因为自身政治系统存在的问题而没能完全统一。但地域毗邻、同为四大古代文明之一^[7]且规模相近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复兴和重生的能力。与日本相比，中国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意识形态的反应相对保守，政治改革节奏缓慢，但最终却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走向现代化^[8]，而不像日本那样经历被占领者改造的国家命运。这些沿不同道路穿越历史的文明命运意味着什么？

如果把目光投到20世纪60—80年代，可以再问，中国大陆周边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曾有过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迅速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又为什么会一路发展，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初步实现经济的转型，社会的发展步入正轨，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文明演进的不同时序，有没有社会历史缘由？包含哪些深层文化意蕴？中国发展的未来态势如何？中华文明的未来形象如何？显然，此类问题都是值得一问的。

亚洲文明的现代转型，日本的情况是一极，印度的情况是另一极，中国的情况恰好处于中间。这恰好与中西文明对接的时空相关。

二、纵论中国历史

以“四统”方法论透视古代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及特点,可见其为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文明。其中政统对文明的主导表现为选择道统、代替法统、统驭学统。

道统对文明的支撑表现为给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提供合理的文化解释,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覆盖学术文化和渗透法治文化。

针对现代文明发展的疑问,本书试图从一个特定角度,以系统科学方法,综合运用各类学术观念和知识,对中华文明的“精神部分”进行文化结构分析,在层层解构其文化内核的过程中,完成对这个独特文明环环相扣的追问和提纲挈领的描述。现按顺序略述其要。

首先从拷问“韦伯—李约瑟问题”出发,引出“中国现代化”问题,扫视现代学人对中国历史的思考。然后在钱穆、金观涛、牟宗三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从文化结构角度透视中华文明的思路,并提出从政统(政治文化系统)、道统(意识形态文化系统)、学统(学术文化系统)、法统(法治文化系统)等“四统”来研究中华文明的方法论。

以“四统”方法论透视古代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及特点,可见其为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文明。其中政统对文明的主导表现为选择道统、代替法统、统驭学统。旧政统的这些文化功能,取决于权力的来源和性质,即旧政统是依靠武力和实力、按“成王败寇”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而,旧政统没有合法性,只有正当性^[9]。道统对文明的支撑表现为给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提供合理的文化解释,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覆盖学术文化和渗透法治文化。传统文明中学术文化被政治文化统驭、被意识形态文化覆盖,但在知识和技术层面有一定发育。传统文明的法治文化附属于政治文化,并浸入了价值文化。

纵向看，从西周到秦汉，中国政统从以天子为中心的宗亲近臣的世袭统治，转变为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集团统治，经历了一场革新，政治文化的开放度有所增加。约在同期，中国道统也从文武周公之类权势人物的思想，转变为由士人阐发的儒家学说。这是道统相对独立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文化。但从秦汉到晚清，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再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因而这段历史充其量只是演变、延续和扩展，或者说是变化，而不是发展。

整体看，主导中华文明的政统在演进中存在“改朝换代”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的来源、传承和保持问题。据牟宗三的观点，传统政治有“治道”，无“政道”，古代文明始终未能摆脱这一困境。从实质看，“换代”问题反映了通过“武力”获得的“权力”自我传承的不确定性；“改朝”则是权力系统延续过程的周期性断续。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角度看，“改朝”现象是旧文明系统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整体失衡的结果，是传统文明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无法避免的历史振荡。

本书后半部分探寻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主题、演进路向和文化意蕴。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也是其“文明度”的低点。传统中华文明不存在“自我现代化”的可能性，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也符合牛顿第一定律^[10]。从晚清到民国，传统文明遭受了“道穷政息”的“断统”之变。这是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相互制约和作用、学术文化逐步发育的过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三个关键性历史事件。

洋务运动的特点是政治权力对技术的把握和利用，戊戌变法反映了政统和道统相互制约的困境。辛亥革命实现

主导中华文明的政统在演进中存在“改朝换代”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的来源、传承和保持问题。

传统中华文明不存在“自我现代化”的可能性，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也符合牛顿第一定律。

辛亥革命实现了中国政统的革命，也为中国现代法治文化打造了新的政治基础。

了中国政统的革命，也为中国现代法治文化打造了新的政治基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代儒家“天子受天命治天下”的“三天主义”，实现了一次道统革命，但在民国初期却与北洋军人主导的政统互不相属，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民初政统的演进格外崎岖，文化原因在于道统和政统的分离及法治文化系统的幼弱，政治权力的把握仍须依托军队和实力，多数政治人物的思维和行为，依然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晚清以来，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学制的改革，新学术文化在民国早期蓬勃发育。在民国政统的基础上，“法原”完成了由君到民的根本性转移，法治文化在此理念基础上缓慢而曲折地发育。民国前期孙中山与北洋政治人物间的角力、民国后期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都是围绕维护和发展民国政统、法统和道统进行的。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虽建立了主导性政统，但政治理念却有退步，还搁置了三民主义道统。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留下了社会历史空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未能实现“共和”，原因在于国民党的“霸政”和“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刷新了中国的政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革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等，是其延伸性发展。

20世纪的国际环境，关键性人物和政党的政治思维及决策，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走势。近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华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统一直在变革、动荡和发展中主导文明的转型。中华文明的旧道统在20世纪初丧失，新道统被塑造出来并不断演变革新，也发挥了凝聚政治势力、寄托社会理想的文化功能。21世纪，中华文明需要从传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未能实现“共和”，原因在于国民党的“霸政”和“无道”。

统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更多营养，以丰富新道统中的文化含量，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打造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从历史趋势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从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传统文明转变为学统引导、法统支撑的现代文明。科技的发展将成为文明进步的前锋，学术文化将逐步由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法治系统的完善将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保障和支撑体系。在20世纪，中国政统的主要功能从统治逐步转向管理，并且始终主导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可以肯定，政治系统还将在宏观上主导中华文明的转型，但其主导方式正转变为调控和引领发展，并且为发展服务。意识形态文化将把支撑文明的地位让渡给法治文化系统，但仍要起凝聚社会、整合理想的作用。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由“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过渡，是文明中的理性不断增加、理想不断发展和落实的过程。

全书目标是从“四统”角度认识中华文明的性质，理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实质。书名“历史的瀑布与峡谷”是用河流象征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国地理看，黄河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中国腹地，汇入世界最大的海洋，因而也被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壶口瀑布是黄河上的胜景，这里借其象征性含义，以“历史的瀑布”暗喻中华文明虽经多次改朝换代和革命，文化流脉却不中断。三峡是长江上有象征意义的景色，这里也参照唐德刚“历史三峡”的表述^[11]，以“历史的峡谷”暗喻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的漫长、曲折、险奇和出峡的壮阔。^[12]

从历史趋势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从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传统文明转变为学统引导、法统支撑的现代文明。

书名“历史的瀑布与峡谷”是用河流象征中华文明的演进。

注 释

[1] 古时“中国”指王城，位置在国土之中。《诗经·大雅·民劳》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就地理含义而言，中国与中原、中土、中华、中夏等同，指华夏人生存的地区。但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这种地理观念中增加了文化含义，起到区别于“四夷”的作用。另外，“中”字在古代还是一种权力的符号，“国”则是权力中心之所在（参阅，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156—1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据王尔敏考证，古籍记载的“中国”义有五端：一为京师，二为国境以内，三为诸夏领域，四为中等之国，五为中央之国（参阅，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84—3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尽管历史发展有多种可能性，不能绝对否定具有多元文化成分的中华文明也有自我现代化的可能性。但就明清两代的中国历史而言，很难认定中国传统文明有自我现代化的趋势。

[3] “中华文明”隐含古代中国文化优越感，因据汉字字义，“中”字最正，“华”字最美。若想摆脱中国人给自己文化定位时的优越感，可从纯地理的角度用“中国文明”的称谓。但“中国”仍是以自己为中心，在亚洲自古也是习惯称谓，除非用China之类的泰西语言才行。当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组成的，是一个复数概念。因而“中华文明”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明”，是多民族文化历史融合的结果，华夏文明只是其主源和主干而已。

[4] 美洲印第安人农业文明中培育出来的重要植物品种有：玉米、马铃薯、红薯、辣椒、西红柿、南瓜、黄瓜、西葫芦、花生、可可、烟草等。由此可见印第安人对现代农业的贡献。在历史上，这些新大